

原著 坎迪达·马奇  
伊内斯·史密斯  
迈阿特伊·穆霍帕德亚

翻译 社会性别意识资源小组



# 社会性别分析 框架指南

# 社会性别分析框架指南

原著:坎迪达·马奇

伊内斯·史密斯

迈阿特伊·穆霍帕德亚

翻译:社会性别意识资源小组

香 港 乐 施 会

2000年8月

English text © Oxfam GB 1999

Chinese translation © Oxfam Hong Kong

This edition © Oxfam Hong Kong 2000 under a license agreement with Oxfam GB and Oxfam Hong Kong

英文版权(1999)属英国乐施会所有。

中译本版权属香港乐施会所有。

本版版权(2000)根据英国乐施会与香港乐施会的授权协议,归香港乐施会所有。

This book is a translation of *A Guide to Gender-Analysis Framework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9 by Oxfam Publishing, 274 Banbury Road, Oxford, OX2 7DZ, U. K. in its Skills and Practice series. This Chinese version is translated by Gender-Awareness Resource Group and is published by Oxfam Hong Kong, 9/F, Breakthrough Centre, 191 Woosung Street, Jordan, Kowloon, Hong Kong under an agreement between Oxfam GB and Oxfam Hong Kong. Oxfam GB can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views or opinions expressed that are beyond a direct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English text.

本书是 *A Guide to Gender-Analysis Frameworks* 一书的中译本,原书英文版于 1999 年由英国乐施会出版社(地址为:274 Banbury Road, Oxford, OX2 7DZ, U. K.)出版,是该社出版的“技巧与实践”系列丛书之一。中译本由社会性别意识资源小组翻译,由香港乐施会(地址为:香港九龙佐敦吴松街 191 号突破中心九楼)根据它与英国乐施会之间达成的协议出版。英国乐施会对中译本中超越原英文版内容的看法或观点概不负责。

## 鸣 谢

本书是根据坎迪达·马奇(Candida March)早些时候编写的一本供乐施会内部使用的小册子加工而成;而该小册子是根据马娅·平托(Maia Pinto)和休·史密斯(Sue Smith)的著作编写,并在迈特拉伊·穆霍帕德亚依(Maitrayee Mukhopadhyay)的支持与管理下出台的。伊内斯·史密斯(Ines Smyth)为本书撰写的前言将这些框架放在较广阔的社会性别和发展工作的环境中。

出版这本书(以及早期的小册子)的原因是想提供一个单卷本,内容讨论发展研究和计划中最有名的那些社会性别分析框架,以及使用者对每一个框架的评价。这些评价主要是基于世界各地的乐施会工作人员以及性别培训网络和学术机构中的同行和合作伙伴们的经验。此外,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最早在奈娜·卡比尔的《颠倒的现实》(沃索出版社 1994)中提出的一些理论。

在讨论各种社会性别框架及其运用时,本书借鉴了许多其它出版物,包括乐施会自己的《社会性别分析手册》中的很多观点和说法。乐施会感谢所有那些允许在本书中使用他们作品的个人和组织,并尽可能地在文中合适的地方注明了资料的来源。而且,这些资料来源在本书最后的参考书目中都再次列出。如果有人的资料未在本书中获得足够的承认,欢迎读者给我们提出意见,以使在本书再版时弥补任何遗漏。

最后,本书的出版也得益于以下人士的支持,他们是: Elsa Dawson、Judy El Bushra、Sukey Field、Laurie Forcier、Georgia Gill、Karoline Kuprat、Yvonne Kuprat、Margaret Legum、Nazneen Kanji、Caren Levy、Fra von Massow、Debbie Mander、Dorinne Plantenga、Tahmina Rahman、Mohga Kamal Smith 和 Caroline Sweetman。

## 译者序言

95 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社会性别概念和理论逐渐为中国的学术界所了解和熟悉,但在实践领域如何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各项活动之中,仍是一个艰难的课题。这要求对各个领域的实践人员进行社会性别意识培训,使他们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并在工作中将这种意识运用其中。

1999 年 3 月 - 4 月,由联合国志愿人员、当时在中华女子大学任教的王佐芳等人发起组织了一次为期 8 天的“社会性别与发展协作者培训”。培训者们的初衷是通过在全国不同地区开展一系列这种类型的培训,为各行各业培养出一批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协作者,从而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社会性别培训网络,带动各个领域(如传媒、健康、社区服务、农村发展、反暴力等领域)的社会性别与发展培训。

这样一个庞大的网络必然需要一个联络沟通的节点,一个能够促进信息与资源共享的机制。或许因为无知因而也无畏,我们五名年轻的女性为这一宏伟的计划所吸引,充满热情地希望加入其中,充当这一联络组织的角色,为促进网络间信息的传递和资源的共享尽一份力量。因此,我们自发组成了一个小组,并给自己起名为“社会性别意识资源小组”。

虽然为自己确立了这一目标,但对于具体如何开展工作,我们心里并没有底。这时,王佐芳向我们推荐了一本书 *A Guide to Gender-Analysis Frameworks*, 即本书的英文原版。这是一本实用工具书,它介绍了国外社会发展项目中常用的几种社会性别分析框架,如果能译为中文,对于中国日渐开展的发展项目具有很大的指导与借鉴意义。而我们五人都是英语专业毕业,正适合于从事这项工作。于是,我们将本书的翻译作为我们小组的第一个项目,并争取到了香港乐施会的资助。

由于缺乏经验,这个项目历时一年有余,远远超出我们最初的设想(6-7个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尝试了参与式的集体运作方式,每个人都以平等的身份积极参与小组的所有活动与决策。这种经历无论是对于我们个人还是整个小组的成长都是极其有益的。在此,我们愿将我们的一些感触与大家分享。

### 黄长奇

这是我第2次参与小组形式的项目。第一次我是一个较为被动的参与者,而这一次,我是项目协调人。

在第一个项目(中加女青年项目,1995-1997,主要进行性别意识培训和出版《女青年通讯》)中,我由一个少言寡语、缺乏自信的害羞女孩变成了一个较为自信、敢于在公开场合发表一点自己见解的女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小组姐妹们对我的不断鼓励,归功于我们之间多次深入的有关生活、工作等方面的谈心,归功于小组内的那种平等、友好、合作的氛围。这次小组经历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因此,当我们这个小组几经讨论终于成立起来时,我非常激动,这将又是一次建立姐妹情谊的好机会,而且我自己也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作为项目协调人协调整个小组的运作。

项目之初,我想得很简单:作为一个以参与式为原则组建的小组,大家应会自觉地分担所有的工作与责任;我所要做的只是提醒大家按时聚会讨论,保证工作按日程开展,并不时向项目资助方通报项目进展情况。于是,我不时地打电话提醒成员们应该完成的工作,每次的聚会也因时间紧迫而只局限于讨论与项目有关的问题。久而久之,我发现大家在接我的电话时少了一份热情,多了一份无奈。我也开始觉得事情有些不大对头。反思我参加第一个项目时的经历,我慢慢悟出了问题所在。我们之间缺乏在生活、学习和工作方面的沟通与交流,而这是培养小组成员之间的感情、增强小组凝聚力的很重要的一种方式。

于是,在以后的活动中,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小组成员在生活和工作学习方面的情况,我们之间关于这方面的话题也渐渐多了起来。于是我们了解到,在我们致力于我们共同的项目之时,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发生着其它一些重要的变化:有的在积极为毕业论文寻找材料,有的面临毕业分配,正在奔走求职,有的在酝酿一场大的工作变动,有的在忙于乔迁新居,有的在学习如何当个好妈妈。这期间,有欢乐希望与朋友分享,也有烦恼希望朋友帮助化解。

当我们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我发现大家的表情轻松多了。而且,大家并没有象我最初担心的那样因为谈论这些“题外”话而延误该干的工作;相反,在这种分享中,我们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大家也真正开始把这个小组看作是自己的小组,因而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小组的协调和配合也越来越好。

通过这次经历,我逐渐认识到,积极参与不是一个可以预先制定的原则,而是一种需要去激发、去培养的主人翁精神。

### 王瑞玲

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幸参加了联合国志愿人员王佐芳在中华女子学院举办的社会性别意识培训,从而第一次接触到社会性别概念。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比较新颖,因此国内发展工作者可利用的中文材料也寥寥无几。我学习英文多年,很想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在此方面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于是,我们五位年轻的女性怀着同样的心愿组成了社会性别意识资源小组,开始翻译《社会性别分析框架指南》一书。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种小组式项目运作方式,感触颇深的就是项目的运作需要每个成员的积极参与,每个成员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并且其他成员都会耐心倾听。碰到问题,大家会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找出最佳解决办法。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几个成员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形成了亲密无间的关系。

任何事情都有不完美的一面,我们小组也是一样。由于我们五位成员或有工作、或有学业需完成,工作、学业压力较大时,就会影响我们对小组活动的投入。因此我深深理解项目协调人黄长奇所付出的劳动。她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是我们当中最为出色的一员。

### 杨惠玉

我初次接触社会性别意识培训活动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张立新老师组织的妇女问题系列培训班上。通过那些活动,我对妇女问题产生了一些兴趣,随后又通过张老师的介绍与同校的王惠一起加入到了社会性别意识资源小组中,结识了长奇、燕灵和瑞玲。在小组活动的过程中,我们五名女性组员从陌生到默契,不仅仅是工作上的伙伴,还成为了相互关心爱护的朋友。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不仅对我们所译的内容有了更深的了解,而且自身的翻译水平也有所提高。

经过这一年多的活动,我发现自己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开始有意无意地运用社会性别知识去对待一些问题。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要求每个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进行为期一年的教育实习。我被分到北师大实验小学一年级二班任英语老师。六至七岁的孩子正是处于社会性别意识的培养期。通过参加一次有关教育领域的社会性别意识讲座,我意识到老师的言行对塑造孩子的性格很重要。老师与家长应促使孩子养成完整的性格,即既具有现今社会所认为的男性的坚强,又具备所谓的女性的细致。在我的实习过程中,我有意识地不去强调女生应该安静、少动,对男生的过分活跃也象管制女生一样来约束;在夸奖学生的言辞上也注意均衡。总之,我不再用以前的旧观念来束缚男女生个性的发展。这是在深入了解了译文背后的基本概念以后培养出的好习惯。

翻译的过程固然烦琐,但我却在其中潜移默化地学到了许多知识,还培养出了我们五人的深厚友情,因此不能不说是受益匪浅



浅。我十分珍惜这个小组的合作,它使我真正参与到其中去学习,去创造。

### 王惠

五个人的小组很温馨。我们经历不同,学识不同,但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我们走到了一起,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互相祝福,合作中凝成的这种姐妹情谊极大地促进了我们的工作。

我们这个资源小组,作为信息协调者,象一个流动着活力的纽带,频繁地与其它小组联系,相互传递信息,补充知识。这种开放式的交流使我增加了阅历,开阔了视野,受益匪浅。

我们小组采取充分参与、民主平等的原则,事无巨细,成员各抒己见,共同决策。这种合作友爱的小组氛围减轻了工作带来的压力,让我感到轻松、愉悦。

翻译的过程充实而艰辛。每一个成员都极其认真,不敢懈怠。只要有疑惑之处,大至句意小至一个词的用法,我们都共同讨论,仔细推敲,从不敢自以为是。为了译好原文,我们经常开小组会,定期讨论问题,还请教专家,力求译准。此翻译历时几近一年,记不清进行了多少次修改与探讨,只记得刚接原文时,一身轻松,对社会性别分析充满无知,也充满好奇;而今,变得成熟,对这一领域有一定的认识。交稿时,如释重负,带着几许胆怯将之奉献给读者,愿能不负读者厚望。

### 龚燕灵

这次项目是在我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其间光搬家就有三次)之余完成的。有时当很多头绪碰到一块时,真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但都坚持下来了,因为我深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从94年的“中加女青年项目”到95年的世妇会,到99年的社会性别意识资源小组,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对社会增加认识以及社会参与程度逐步加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到,积极地参与不仅需要观

念上的认识,更需要可操作的科学方法。相信这本书里介绍的一些方法会对社会性别培训以及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去做的相关项目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这次项目对我来说又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经历。在翻译过程中,我对一些关键概念从一无所知到有所了解,对社会性别培训的一些常用方法也有了初步了解。在本地个案分析中,我们开始学着使用书里的一些方法,尤其是摩塞框架,来对一个具体的项目进行分析。这样,就迈出了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一步。

另外,我更进一步地意识到小组协作和参与式的项目运作方式的价值:充分发挥和调动每一个小组成员的潜力,在各项活动中通过充分又平等的参与达到产出的最大化,不仅是在量上,也是在质上。

其实,在我承担的那部分翻译任务里,我的丈夫也成为了我的亲密战友。从一开始的查找词义,分析句子结构,到实际的翻译,电脑输入,几次的修改,他都充分地参与,从而使我能与其他小组成员步调一致。在问及他的感受时,他说他学到的其中一点就是:以后分析社会现象还可以用社会性别分析这一新的角度。我想,这也肯定会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

我们仍然是一个年轻、缺乏经验的小组。我们热切地希望读者们给我们提供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不论是关于本书,还是关于我们小组以后的发展。我们的联络地址:北京百万庄大街24号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100037),黄长奇(收)。

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对香港乐施会,特别是项目联络人邓文嫦女士表示感谢,在项目的整个过程中,她一直给予我们鼓励和支持;感谢王佐芳女士,是她为我们勾画了一幅美丽的蓝图;感谢为我们审稿的香港的张彩云女士和乐施会的蔡毓毓女士以及《中国妇女报》的冯媛女士;感谢支持甚至部分参与我们工作的丈夫和男朋友们;于晓南、薛立胜、李刚及魏海舰;以及其他为本书做出贡献

的热心人士：刘伯红、宋美娅、李涛、任向芬、马小朵、张立新、张彦红、吴奇志、吴凌云及王云仙。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英国乐施会出版了本书的英文原版，并授权香港乐施会出版这本中译本。

# 目 录

鸣谢 .....	( I )
译者序言 .....	( II )
<b>1. 本书的背景 .....</b>	<b>( 1 )</b>
1.1 前言 .....	( 2 )
1.2 重点概念 .....	( 16 )
1.3 选择框架 .....	( 22 )
<b>2. 社会性别分析框架及使用者的评价 .....</b>	<b>( 30 )</b>
2.1 章节解释 .....	( 31 )
2.2 哈佛分析框架和以人为本的计划 .....	( 33 )
2.3 摩塞框架 .....	( 62 )
2.4 社会性别分析模型 .....	( 79 )
2.5 能力与脆弱性分析框架 .....	( 91 )
2.6 妇女赋权(朗维)框架 .....	( 108 )
2.7 社会关系分析法 .....	( 119 )
参考书目 .....	( 141 )
附录:伦敦大学学院发展计划部(DPU)的社会性别政 策及计划项目(GPPP) .....	( 146 )
注释 .....	( 155 )
译者附录 I:组织机构名称中英对照 .....	( 157 )
译者附录 II:术语中英对照 .....	( 159 )
译者附录 III:运用摩塞框架分析“北京打工妹之家” 项目 .....	( 163 )

# 1. 本书的背景

1.1 前言 .....	(2)
1.2 重点概念 .....	(16)
1.3 选择框架 .....	(22)

## 1.1 前言

伊内斯·史密斯

这本短小的社会性别分析工具和框架指南是在 1996 年出版的一本仅供乐施会内部人员及合作伙伴使用的小册子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本书旨在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源,讨论最负盛名的一些分析框架的方法;这些框架都被用于将社会性别角度纳入发展的行动之中。它为每一个框架提供了实用例证,并提供了深入浅出的评价,包括该框架的可能用途、优点和局限性,以及最新的发展。这些评论吸取了来自乐施会工作人员、合作伙伴和其它组织中的同行的广泛经验,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各种培训、计划和评估过程中使用过这些社会性别框架。

本书旨在满足发展项目的工作人员、培训人员、研究人员和学生要求了解这些社会性别框架的需要;我们还希望它对那些对社会性别框架主要概念和方法已有所了解的人也有一定的用处。但是,本指南并不试图成为一本全面的手册或一本严谨的教科书,例如它并没有包括这些社会性别框架原来所包含的多样的技巧和信息。更重要的是,使用者的评价并不全面,也没有按照“科学”的方法对其内容加以校勘核对。它们只是捕捉了社会性别与发展工作人员在使用这些框架时的一些经验,并列举了在特定情形下运用不同的社会性别框架的可能与局限。本书意在“抛砖引玉”,让读者初步了解这些社会性别框架能够提供的许多实用的见解。

我们希望本书能激励读者去阅读更为详细的有关这些社会性别框架的原始书籍和文章。这些原始文本的见解源于它们对性别平等的信念和承诺。那些不能直接或立即应用这些社会性别框架的人——发展机构和政府机构的管理人员、研究人员、学生和培训

人员——都能从中获益。

在我们介绍和讨论本书中所选择的社会性别框架之前,本前言试图先将它们放在将社会性别角度纳入发展工作的广阔背景中去。我们希望在此强调,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框架会鼓励发展工作人员在其工作和实践中协助推动争取性别平等和妇女权益。然而,发展工作人员必须运用适当的社会性别框架,并以敏感且熟练的方式加以运用时,这种潜能才能变为现实。而且,对这些框架的运用,必须建立在从政治理念上和个人情感上承认社会公正原则(包括性别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

## 发展机构关注社会性别议题的历史

在发展中关注社会性别平等已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可以做为历史记录的一个主题。这些记录经常描述发展政策和计划经历了所谓的从福利方式到注重公平,进而重视效率,到最后以妇女的自我赋权为目标的这样一个演变过程(摩塞 1993)。这些方式也被认为是同时并存的,也许作为特定政府或机构的独立政策,或者在一个机构内部经过混合和重组,从而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政策(安德森 1992)。

不论这些记录有何优点,它们所做的最重要的区分是分辨两种主要政策角度:旨在将妇女纳入发展项目中,令发展项目变得更有效率的妇女参与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WID)方式,和关注与发展有关的男女社会角色方面的不平等的社会性别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GAD)方式。从其中一种方式向另一种方式转化的益处和其它地方有详细的讨论(例如,埃尔森 1995 和卡比尔 1994),因此这里就没有必要展开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社会性别与发展方式内部,也同时存在着很多种角度(利维 1996)。因此,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它所包含的可能做法上,社会性别与发展作为一种政策和计划方法仍很复杂。

对发展中的妇女和性别问题的不同解释的历史记录揭示出了

一些新的东西。从早期的争论可以清晰地看出,社会态度非常强大,它们影响着为妇女而设的项目的特点以及这些项目达到目标的能力(布维尼克 1984)。当从“妇女参与发展”方式转向“社会性别与发展”方式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尖锐和集中了:发展机构和其它相关组织的文化、规则和工作成果被视为受制于社会性别观念的规范(格尔茨 1995)。在父权制社会里,这意味着各种机构的文化、规则和工作成果都是以男性价值观念和态度为标准,因而通常对妇女不利,没有承认并奖励她们对机构的贡献。因此,它们再造和繁衍着在世界许多地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和不平等。

## 什么是使社会性别议题“主流化”

当我们不再关注发展的参与者做什么和使用什么方式来做,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他们是谁这个问题,就会要求各机构将社会性别议题“主流化”,即把对社会性别问题的关注融入每个机构的优先考虑事项和工作的各个方面。“主流化”作为一个目标的确切含义以及使它实现的方式等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许多人认为,“主流化”意思是使对社会性别的关注成为一个机构中所有人的责任,并保证将其纳入所有的体系与工作中去(这被视为另一种选择,不同于将对社会性别的关注视为一小群专业人员或部门的责任的做法)。批评这种方式的人士已经指出,这种通过将性别议题作为每个人的责任,以期达到社会性别议题主流化这一目标的做法有一些弊端。他们认为这会削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或扭曲问题的实质,或者由于缺乏一致和连贯的关注和资源上的支持以及决策者持续的承诺,加上男性的抵制,这些问题最后会被完全遗忘。相反,一个专设的部门尽管可能处于机构的“边缘”,却有可能迫使各机构发展和维持一个更明显和激进的对性别平等的承诺。

使人感到混乱的是,其他一些人运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努力实现“主流化”的目标;通过建立国家“机器”或专设机构(如



委员会、专设部门等)将处理社会性别问题的系统和任务区分开来。一些政府和机构曾通过这种方式显示它们认可了妇女问题的重要性(德尔罗萨里奥 1995)。但是,这种方式也有其缺陷,特别是国家机器经常被“证实很软弱、缺乏资源,在变幻的政治风云面前很脆弱,易于被政党所控制”。(伯恩和莱耳 1996, 1)

目前所达成的共识似乎是机构需要结合运用这两种方式——将社会性别角度纳入到整个机构中去,同时维持一个专设部门或单位——以避免社会性别问题被边缘化或被主流意识形态同化。总的说来,“主流化”被认为是从只关心如何令妇女干预发展活动或进入官僚机构的“融入”方式(‘Integrationist’ approach)向前迈进了可喜的一步。“使社会性别议题主流化既是一个技术过程,也是一个政治过程;它要求组织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也要求国际机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目标和资源分配方面做出转变。”(卡尔达姆 1998)<sup>1</sup>

## 社会性别分析框架在使社会性别议题“主流化”中的作用

社会性别分析人员经过早期的讨论达成了一致意见,他们认为要想把社会性别角度纳入我们机构的文化、体制和工作的“主流”中去,不仅需要理解这一目标的内容,而且要了解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布维尼克 1984,安德森 1992)。政策制定者和执行发展计划和项目的各级人员都表达了对实用工具的需要。例如,卡罗琳·摩塞强调指出:“.....许多承诺将社会性别角度纳入其政策、计划和项目中去的人仍然缺乏必要的计划原则、方法和工具.....计划者需要简单易操作的工具以便帮助使他们在计划过程中考虑到特定情境下复杂的特殊情况。”(摩塞 1993, 5)

玛娅·布维尼克认为,结合运用以上两种方式将社会性别角度纳入机构的“主流”,意味着必须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 一个特定的发展机构及其成员所面对的内部和外部政治进